

诸夏一体到九州攸同之考古学观察

马龙

夏时期,经历了一个由龙山时代方国林立、万邦自治到二里头王国统一中原、引领九州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文化格局、生业经济和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体现,整体呈现出夏时期“诸夏一体到九州攸同”的进程。本文试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个历史过程简述如下。

文化格局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山文化晚期:龙山时代黄河流域“万邦林立”。至公元前2200年左右,一场突然的、严重的梅加拉亚期特大干冷气候事件袭来(Cohen, K.M., etc. 2018)。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了晋南的陶寺文化(韩建业,2007),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最辉煌的陶寺邦国衰落。海岱龙山文化延续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态势,推动了豫东的造律台类型的西进(李伯谦,1983;赵江运,2021)。南方的石家河文化则一直在单向袭扰中原。而西进受到客省庄文化阻挡的三里桥文化则掉头东侵,也剑指嵩洛地区(段天琛,2013;董霄雷,2020)。为应对各方势力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变局,嵩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选择了交好东西、攻伐南北的策略。向西,与三里桥文化及客省庄文化交好,三方交互的器物主要是饮食器、盛储器,炊煮器极少(袁飞勇,2020),基于此,我们认为三方之间是和平的往来与联合关系。向东,联合亲近中原的造律台类型,造律台类型与王湾三期文化有许多共享的文化因素,如侧装高足鼎、圈足盘、刻槽盆、小口高领于瓮、平流鬲、覆碗形器盖等,有学者甚至将之与王湾三期文化归为同一种文化(袁飞勇,2020)。向南,王湾三期文化兵分东西两线联合东西两方南下攻伐并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使长江中游从此“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王巍,2004)。向北,王湾三期文化与造律台类型及海岱龙山文化共同参与了海河流域的后岗二期文化的形成(袁飞勇,2020)。

“众星是仰北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联合南下的同时,也在彼此间进行着整合。二者相互整合的产物即新砦二期遗存。新砦二期遗存形成后取代了王湾三期文化,并继续向南施加影响(张海,2021)。新砦二期遗存的发展催生了二里头文化的异军突起,又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孕育期(王立新,2020)。二里头文化崛起后迅速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赵海涛,许宏,2019)。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四方文化因素的同时(许宏,2009),也在向四面八方辐射影响(崔宗亮,2011)。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将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纳入文化势力范围(张昌平,2006),并进一步向鄂南、湖南、赣鄱地区施加影响(向桃初,2011);向东南的扩张影响了江淮的斗鸡台文化的进程(杜金鹏,1991)和太湖的马桥文化的面貌(向桃初,2011),并将一些文化因素传播至华南甚至越南;向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催生了三星堆文化(向桃初,2005)和朝天嘴文化(于孟洲,2010)。二里头文化向北对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李伯谦,1991),推动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张渭莲,2007);向西北影响了晋中的白燕文化的面貌(蒋刚,2009);向东北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杜金鹏,1995)。二里头文化向西渗透到了关中东部(张天恩,2000),并将文化影响力扩散到甘青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之中。不过,二里头文化向东扩张至豫东时,则遭到岳石文化的抵制,使二里头文化并没有渗透到海岱地区(郭明辉,2020)。

生业经济

古代生业经济一般分为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中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可具化为先民如何获取食物资源和管理家畜等方面。

禹州瓦店(陈相龙、方燕明等,2017)、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等遗址的材料表明,王湾三期文化核心聚落以粟作农业为主导,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家养动物有狗、猪、黄牛、绵羊,先民的食谱特征是C4(食粟)。余庄遗址当地先民的食谱则主要呈C3特征,植物浮选结果显示他们的主食可能是块茎。郟城郝家台遗址的先民则存在C4(食粟)和C3(稻或渔猎)两类比例不相上下的食谱特征(周立刚,2017)。这表明龙山文化晚期不同区域的核心聚落的生业模式有着明显差别。

新砦二期时,新砦遗址的农业结构和家养动物类型与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同(袁靖,2016),新发展是种植了小麦(赵志军,2007),绵羊由放养转为人工圈养。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和家畜管理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新增添了山羊和大中型鹿成为家养动物(李唯,2022夏文化论坛)。但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李唯称之为“中心化和规范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仅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稻旱并重的农业结构(许宏、袁靖,2019);而二里头文化的外围一漯河等地(李艳江等,2022)和二里头核心区的一般聚落(如洛阳皂角树遗址)仍以传统旱作农业为主导。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相对漯河等外围区对家畜的管理方式更规范、圈养程度更高(李唯,2022夏文化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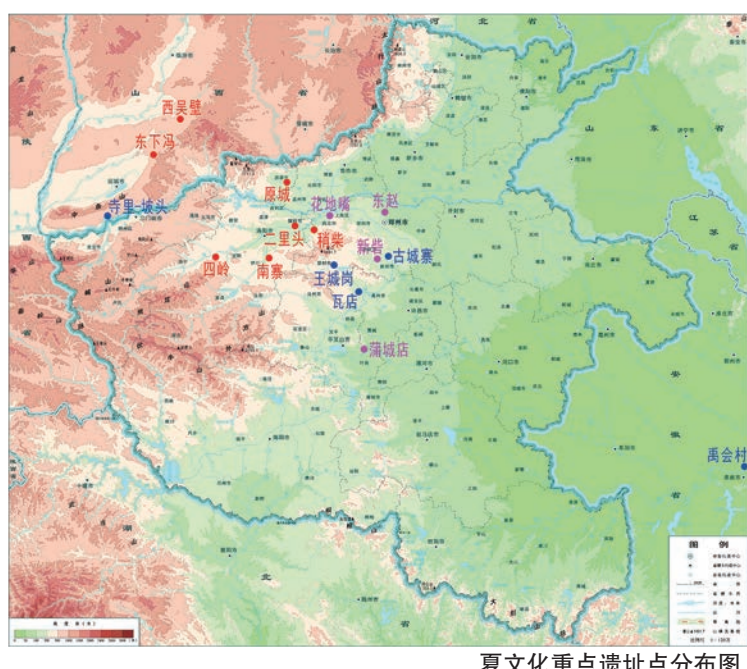
社会结构

龙山文化晚期,中国境内传统核心区域的聚落数量普遍下降,只有中原和晋南没有明显衰落(张弛,2017)。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聚落数量也普遍下降,距离洛阳盆地越远,越有衰落的迹象(张弛,2017),而洛阳盆地一带聚落数量迅速回升(张海,2021),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增量约320%(许宏、袁靖,2019)。聚落数量的激增反映了人群的快速聚集,结合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遗址开始兴建大型宫室和生产各种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现象,笔者推测,核心区人群快速聚合有可能与二里头王国强制征发甲兵力役有关。

龙山文化晚期呈现的是多核心式聚落结构,禹州瓦店聚落、王城岗聚落、古城寨聚落、郝家台聚落、平粮台聚落均是地方核心,且均是建有城邑的大型聚落,在各自周围又有中型和小型聚落,共同构成多核心的三层聚落等级结构。这种多核心式结构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崩坏,转变为以二里头遗址为单一核心的聚落结构。聚落等级方面,据许宏分析,二里头文化构建的是四层等级的聚落体系。上述现象表明,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结构由多核心向单一核心转变,体现了由多元一体到中原一统的历史趋势;聚落等级由三级聚落体系演变为四级聚落体系,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聚落分层和社会组织结构。

综上所述,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由多方联合、攻伐外敌走向中心辐射、引领万邦,生业经济由各区各有差别走向“中心化和规范化”,社会结构则由多核心式的板块结构转变为单一核心式的圈层结构。结合“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尚书·禹贡》)的记载,我们认为由夏早期(即龙山文化晚期)“诸夏一体”发展到夏中晚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九州攸同”的历史过程,是清晰而明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



夏文化重点遗址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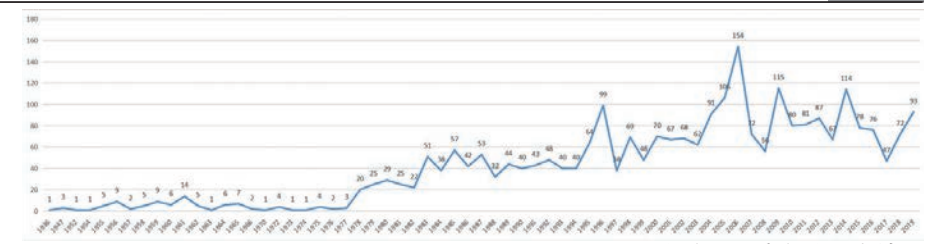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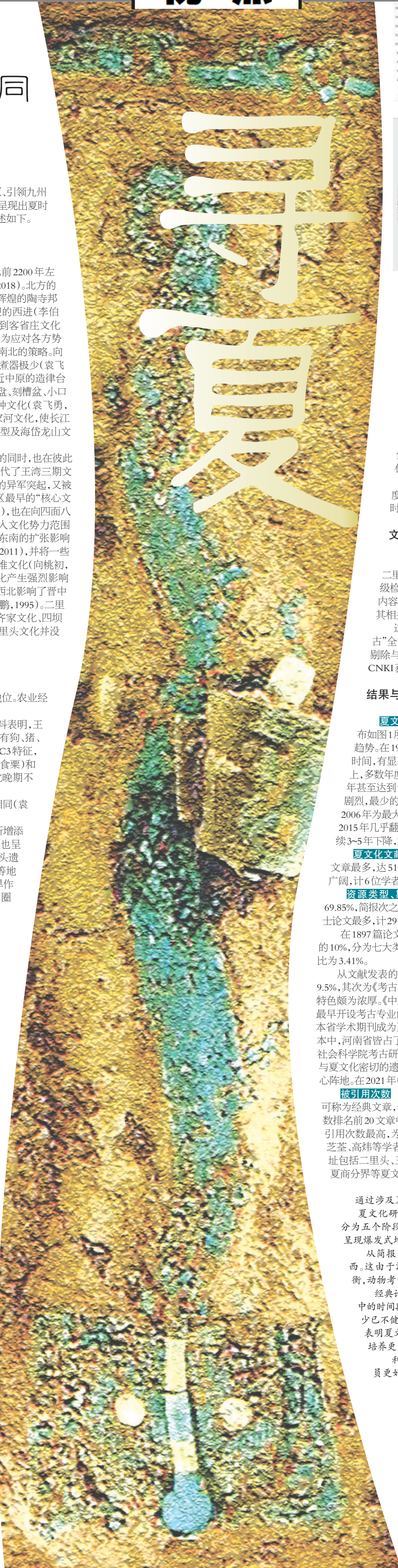


图1 夏文化主题文章年度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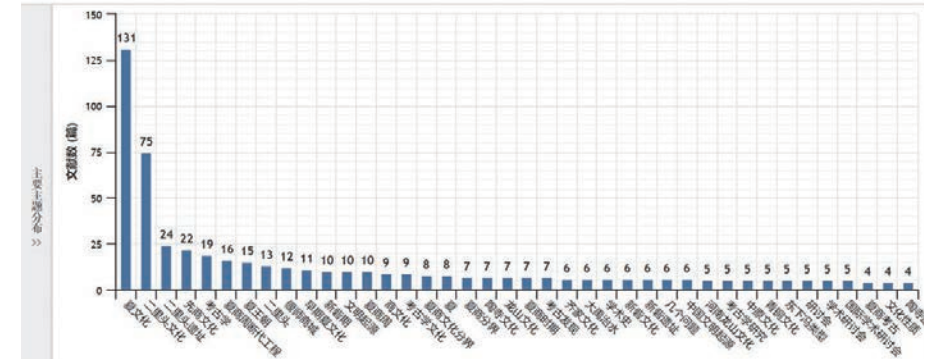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主题分布

中国夏文化考古文献初步计量分析

高振龙

夏文化是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关键节点,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上半叶便有学者提出对夏文化的研究,以徐旭生先生偃师二里头遗址调查为肇始,考古学界开始了对夏文化的全面探索至今。近百年的长河中,发表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从探索夏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到具体遗址的发掘实践,初步勾勒出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态和夏文化的面貌。

笔者通过对涉及的夏文化考古文献进行搜集,初步分析夏文化领域文献特点,如年度发文数量、主要作者、发文类别、主要期刊、引用次数等,为相关科研人员与管理机构及时掌握夏文化研究态势提供数据参考。

文献数据搜集与方法

本文数据有两大来源,一类为《夏文化考古文献存目》,该书几乎囊括了从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的所有文献目录,是一本关于夏文化文献最系统的工具书;另一来源是在知网高级检索条件下数据搜集,主要针对的是上述工具书不具备的相关文献被引用的数据及针对内容的主题词搜集。在具体统计时,原则上只统计第一作者;部分期刊或者研究所改名,其相关文章均归属于现名;对于外文译稿,仅统计原作者。

这里主要说明一下知网数据搜集。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条件下,以“夏文化”为主题、“考古”全文,均设置为“精确”,两者词组逻辑关系为“AND(且)”。在初步获取数据的基础上,人工剔除与“夏文化”无干系的文献,共获得709篇文献,数据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26日。将在CNKI获取的文献数据进行导入Excel,被引量部分可视化分析。

结果与分析

夏文化研究的年度文献 统计,与夏文化主题相关的文献为自1936年开始至2019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共计2716篇。按照发文数量与年代,可划分五个阶段,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而呈上升趋势。在1977年以前,关于夏文化文献缓慢增长,趋势线表现较为平滑;1978年至1982年,合计5年时间,有显著提升,每年数量维持在20~29篇之间;1983年~1995年的13年期间,快速提升至30篇以上,多数年度超过40篇;1996年~2005年期间,10年期间,突破50篇以上,基本维持在70篇左右,1996年甚至达到99篇;2006年,突破百篇,使得2006年迄今为发文量最高的年份,为154篇,之后起伏颇为剧烈,最少的年度仅有47篇,最多的年度超过100篇。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阶段的起伏有一定规律,2006年为最大峰值后,连续将年降低,而后的2009年突然增至115篇,随后4年处于整体下降趋势,次年2015年几乎翻倍,同样低谷、翻倍又在2017年、2018年出现。这一规律为某年度发文量创达到峰值后,连续3~5年下降,触底,然后再次猛然反弹,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为3~5年为一个周期。

夏文化文献的主要贡献者 按照篇数梳理涉及夏文化的文献共计867人,2288篇。以许宏先生著墨文章最多,达51篇,40篇以上为李维明、何弩两位学者,30篇以上为张国硕、方西生、方燕明、杜金鹏、袁广阔,计6位学者。多数学者贡献1篇,为555人,占比为63.5%,2篇者为141人,占比为16.2%。

资源类型、期刊分布 可统计2716篇中,有8类来源,其中文献以论文成果形式发表的占比为69.85%,简报次之,为14.51%;图文类最少,仅有16篇。在所有硕博论文中,又以郑州大学涉及夏文化主题硕士论文最多,计29篇,约占1%。

在1897篇论文中,以传统考古学论文形式发表的有1692篇,其余为科技考古,共计205篇,约占总论文的10%,分为七大类,以动物考古占比最大,64篇,占整体科技论文的31.22%,碳十四测年最少,仅有7篇,占比为3.41%。

从文献发表的刊物来看,2588篇文献中,来源于433处刊物,较为分散。《中原文物》为首位,246篇占比9.5%,其次为《考古》,223篇占比8.6%。将前20位文献来源排列出来,不难发现涉及夏文化的学术期刊地域特色颇为浓厚。《中原文物》《华夏考古》《殷都学刊》均为河南省高校或者研究所主办,郑州大学是河南省最早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之一,河南省又是夏文化遗址分布的核心区,天然的人才资源、考古资源使得河南省学术期刊成为夏文化研究的重要矩阵。又在不同区域发表的简报或者报告统计,有简报392篇、报告43本中,河南省皆占了近四分之三,简报或者报告署名机构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最多,其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而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陶寺遗址等与夏文化密切的遗址长期由其负责,又是考古界最具学术权威的核心期刊之一,成为涉及夏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在2021年中文社科引文索引考古学科入选的7个期刊中,均曾刊登过涉及夏文化的文章。

被引用次数 一般认为,被引用次数愈多,表明该文献愈具有参考价值 and 影响力,对学科的贡献愈大,可称为经典文章,也是评估一个学者研究水的重要尺度之一。在知网所获得的数据,如表2所示,引用次数排名前20篇文章中,开启夏文化考古探索的徐旭生先生调查报告《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引用次数最高,为190次,其次为李伯谦先生的《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为102次,邹衡、赵芝荃、高炜等学者的涉及夏文化文献论述被引次数也居多。图2主题词分布中,涉及夏文化研究的核心遗址包括二里头、王城岗、偃师商城、东下冯遗址、新寨、古城寨,涉及研究课题包括文明起源、族属、测年、夏商分界等夏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争议性问题,集中体现了夏文化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通过涉及夏文化的文献进行检索与初步分析,认为:

夏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研究近百年了,在1949年以后得到逐渐发展。文献依据年度发表量趋势,可分为五个阶段,关键节点分别在1978、1983、1996、2006年度。特别是2006年之后,关于夏文化的文献呈现爆发式增长,并且表现出3~5年为一周期。

从简报、报告、主要期刊涉及的区域来看,文献呈现于明显地域性,集中于河南省,涉及山西、陕西。这由于河南省是夏文化遗址的核心分布决定的。论文方面,科技考古比重较低,且内部也不平衡,动物考古学发力较多,而其他科技手段比重亦偏低。

经典论文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21世纪后则明显较少。以2006年左右夏文化研究最为集中的时间段为例,多数发文学者当时年龄集中于30~50岁之间,如今这批人年龄多超过60岁,甚至有不少已不在。而近年来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夏文化年轻学者较少,多数也仅发表1~2篇论文,这一方面表明夏文化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样,进入后大家时代,另一方面也提醒,夏文化研究方面,需要集中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学者。

利用文献管理建立夏文化文献的数据库,可以实现对夏文化文献的系统管理,方便研究人员更好的选择研究方向,促进夏文化的研究。(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表1 夏文化文献的主要贡献者

作者	篇数	作者	篇数
许宏	51	赵芝荃	23
李维明	44	李先登	23
何弩	42	李伯谦	23
张国硕	32	郑光	22
方西生	32	高炜	21
方燕明	32	董琦	21
杜金鹏	32	杨育彬	20
袁广阔	31	高江涛	19
赵春青	25	郑杰祥	18
安金槐	24	李民	17

表2 被引次数前5的文献

题名	作者	发表时间	被引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徐旭生	1959	190
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	李伯谦	1986	102
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高炜 杨锡璋 王巍 杜金鹏	1998	86
新砦一里头—二里头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	张雪莲 仇士华 蔡莲珍等	2007	83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邹衡	1979	71